



中山大學 實踐哲學研究中心
Center for Practical Philosophy, Sun Yat-sen University

實踐哲學研究中心
CENTER FOR PRACTICAL PHILOSOPHY

工作簡報

第四十五期

二零一九年八月編印

目 录

中心动态

- 江璐在《哲学研究》发表文章1
 - 郝亿春在《哲学研究》发表文章1
 - 马万东获 2019 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1
 - 曲轩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12 批特别资助1
 - 林进平等参加“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学术研讨会1
 - 郑劲超参加“重访列斐伏尔：法国理论与中国道路”学术研讨会.....2
 - 郑劲超参加第四届“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研讨会.....2
 - 凌菲霞参加第七届世界文化发展论坛.....2
 - 凌菲霞文章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3
 - 王兴赛参加“德国哲学：启蒙与理性”学术研讨会3
 - “异质性哲学导论”课程分享和报告会3
-

学术活动

- 异质性哲学工作坊第 1 期综述.....4
- 逸仙实践哲学研习会第 53 期综述8

●实践哲学读书会第 18 期综述·····	12
●实践哲学读书会第 19 期综述·····	13
●实践哲学读书会第 20 期综述·····	14
●异质性哲学讨论班第 4 期综述 ·····	15
●异质性哲学讨论班第 5 期综述 ·····	17
●异质性哲学讨论班第 6 期综述 ·····	18
●异质性哲学讨论班第 7 期综述 ·····	29

论文摘要

●徐长福：《直观认识与符号认识——异质性哲学引论》·····	20
●江璐：《道德行为归责的可能性》·····	20
●江璐：《〈名理探〉中对逻辑作为一门科学的讨论》·····	20
●江璐：《康德之人格性概念的形而上维度》·····	21
●郝亿春：《价值与“心”》·····	21
●邓伟生：《人生计划、运气与美好人生》·····	21
●张守奎：《〈共产党宣言〉在台湾地区的传播和研究》·····	22
●张守奎：《马克思财产权批判理论的生成逻辑及当代意义》·····	22
●谢翱：《费尔巴哈感性哲学的再思考》·····	23
●王千陌：《自由主义自我观念的价值虚无主义悖论》·····	23
●王千陌：《黑格尔国家观念的二重性》·····	24

广州市海珠区新港西路 135 号中山大学南校区锡昌堂

邮编：510275

责任编辑：王兴赛、饶琳

校对：刘畅

◆中心动态◆

江璐在《哲学研究》发表文章

中心成员江璐副教授在《哲学研究》2019 年第 4 期发表文章《道德行为归责的可能性——评聂敏里〈意志的缺席——对古典希腊道德心理学的批评〉》。本文为《哲学研究》刊物以“自由意志”为主题的 2018 年度学术会议中的评论文章。本文所评论的聂敏里教授的文章已发表于《哲学研究》2018 年第 12 期。

郝亿春在《哲学研究》发表文章

中心成员郝亿春教授在《哲学研究》2019 年第 5 期发表文章《价值与“心”——布伦塔诺对价值哲学的“内转”及其意义》，署名单位包含实践哲学研究中心名称。

马万东获 2019 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

2019 年 6 月，中心成员马万东副教授（南方医科大学）获 2019 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课题名称为：德性解构背景下的西方现代道德话语研究。

曲轩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12 批特别资助

2019 年 6 月，中心成员曲轩博士（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室）获得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 12 批特别资助（站中）。

林进平等参加“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学术研讨会

2019 年 6 月 22 日，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与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学术研讨会在中山大学文科楼举行，中心成员暨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林进平教授主持开幕式并致辞。在会议中，林进平教授作了题为《析从人性的视角探索马克思主义的正义的三种路径》的报告。中心成员

林育川副教授作了题为《分配平等与社会平等之关系辨析——兼及马克思主义平等观的特质》的报告。中心成员林钊副教授作了题为《马克思、托克维尔与现代民主的危机》的报告。中心成员龙霞副教授作了题为《黑格尔“国家精神”的预备性理解——思想史视域中马克思<博士论文>的主旨新探》的报告。中心成员张守奎副教授（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作了题为《青年马克思对现代性政治分裂本质的批判与超越——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的“长子继承制”批判为例》的报告。

郑劲超参加“重访列斐伏尔：法国理论与中国道路” 学术研讨会

2019年6月1日至2日，中心成员郑劲超博士受邀参加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南京大学哲学系主办的“重访列斐伏尔：法国理论与中国道路”学术研讨会。来自全国30余所高校及科研院所、杂志社、出版社的近50位专家代表莅临，还有很多来自不同高等院校的青年学者和高校学生参与了现场会议的问题讨论和交流。郑劲超博士以《“历史的主体”与“集中的形式”：列斐伏尔论城市与都市》为题做专题报告。

郑劲超参加第四届“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 学术研讨会

2019年6月14日至16日，中心成员郑劲超博士受邀参加在华侨大学举行的第四届“现象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研讨会，以《对立与差异：利奥塔对辩证法的一种批评》为题做大会专题报告，并与来自南京大学、复旦大学、厦门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天津师范大学、黑龙江大学等高校的参会专家学者进行了交流讨论。

凌菲霞参加第七届世界文化发展论坛

2019年6月9日，中心成员凌菲霞博士参加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的第七届世界文化发展论坛。本次论坛由埃及艾因夏姆斯大学、湖北大学、中山大学等高

校联合举办，为期两天。与会学者围绕“道德共识与人类共同价值构建”这一论坛主题，就“道德共识形成的不确定性”、“道德共识的时代转换及其主动性认同”和“道德共识与美好生活”等议题贡献智慧。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李萍教授主持了第一阶段的主旨发言，并在第二阶段的主旨发言上做了题为《“关怀”与“正义”的优先性及其整合的批判》的报告。凌菲霞博士在次日第一阶段的主旨发言和闭幕式上担任翻译，并在首日的分论坛上做了《特朗普主义对美国意识形态的影响及中国的对策》的报告。

凌菲霞文章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转载

中心成员凌菲霞博士的论文《伯林与麦克莱伦的马克思研究模式》（原文载《哲学分析》2018年第4期，原标题为《“刺猬”与“狐狸”：伯林与麦克莱伦的马克思研究模式》）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9年第2期“马克思主义理论”栏目转载。

王兴赛参加“德国哲学：启蒙与理性”学术研讨会

2019年6月21-23日，中心成员王兴赛博士参加由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德国哲学专业委员会主办、贵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和贵阳孔学堂文化传播中心承办的“德国哲学：启蒙与理性”学术研讨会暨中国现代外国哲学学会德国专业委员会2019年年会。王兴赛作了题为《青年黑格尔与启蒙——兼论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报告。

“异质性哲学导论”课程分享和报告会

2019年6月20日，中心举办“异质性哲学导论”课程分享和报告会，由周宏胤主持。第一环节由助教周宏胤介绍本学期课程情况，包括以下方面：一般情况；网络平台情况；随堂报告情况；期末论文情况；课程评价情况。第二环节是研究生同学李婷婷、杨兴升、罗丽芳和王娇等做报告。第三环节是本科生同学柳明、热吉布拉、袁臻荣、卢锐和赵一心等做报告。中心主任徐长福教授对周宏胤的工作以及相关同学的报告作了肯定，并对部分同学遇到的专业问题作了解答。

◆学术活动◆

异质性哲学工作坊第1期综述

2019年3月21日,“异质性哲学工作坊”第1期在中山大学锡昌堂420室进行。“异质性哲学工作坊”是本中心新设的一个学术讲座系列,属于以“异质性哲学”为主题的学术活动范围,在这一范围内还包括“异质性哲学研讨会”和“异质性哲学讨论班”等活动。这一讲座系列旨在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国内的异质性哲学研究,尤其是鼓励年轻学者对异质性哲学的理论探索和实践应用。“异质性哲学工作坊”第1期由郑劲超博士作报告《异质性理论在法国——从哲学到20世纪人文科学的进展》,邓伟生副研究员主持,杨玉昌副教授评论。

“异质性”是法国现代思想中的关键概念之一。在词源上,法语中的“异质”(hétérogène)一词来源于古希腊语和拉丁语,它由前缀 heteros (hétéro-) 和后缀 genos (-gène) 两部分构成。在古希腊语中, heteros 用来形容不相同的、不同类的东西,而 genos 则是指氏族、后代、种族、世代、性别或生物分类中的属。早在柏拉图的《智者》中,“异”就已经作为最重要的理念之一而出现。在海德格尔那

里,柏拉图的关于存在的整体的形而上学转变为关于存在者与存在之“同一与差异”的辩证法,这一点后来成为了法国现象学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契机。随着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兴起,“异质”的概念更多地出现在狄德罗、霍尔巴赫等人的哲学著作中,它被用来描述世界的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关系,强调用质的区别而不是量的区别来解释自然界中所存在的多样性。因此,“异质”或“异质性”(hétérogénéité)的概念在法国哲学中不仅具有形而上的、思辨的特征,而且往往与经验的、实证的科学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在后来的柏格森思想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郑劲超博士在第一部分讨论了法国近代哲学中的异质性概念,以狄德罗和柏格森为例。狄德罗通过“异质要素”的概念确立了一种普遍变异的哲学唯物主义世界观,而柏格森在反思科学和形而上学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种具有“异质性”的“绵延”概念,来澄清“数量差异”与“性质差异”之间的混淆。

在第二部分,郑劲超博士讨论了异质性与20世纪法国人文科学的进展。

简而言之，巴塔耶、结构主义和克里斯蒂娃对“异质性”概念进行了更加具体和深入的阐释，使“异质性”概念进一步深入到心理结构和社会结构的理论解释之中。

精彩互动

杨玉昌：异质性，特别是法国哲学中的异质性，是值得重视的。法国文化比美国物质消费文化意义更加深刻。特别是其中的现代化问题，值得我们去研究。同时，受法国大革命的影响，法国文化也同中国文化有更多相似性。所以郑博士的文章在这方面开了一个好头，希望以后能有更细致的研究。

异质性为什么在 20 世纪尤其是在法国哲学中从 50 年代到 80 年代如此受重视？其原因，从哲学层面说，是起于柏拉图主义的形而上学的终结，这是诸如尼采和海德格尔等人所做的工作。在西方传统中，柏拉图主义是通过形而上学来解决这种异质性问题的。柏拉图通过形而上学来解决现象的差异性、变化性。现象世界以更高的理念世界为模范，而理念世界是统一的、不变的、永恒的。但到了 19 世纪和 20 世纪，这样的理论受到质疑并被颠覆了，一些哲学家提出了柏拉图主义的终结。这样一来，异质性问题、生存性问题就突出出来。“抽象之为抽象就在于其抽掉了某些细节，而要紧的正是这些细节”，这是对原来的一种批判。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河流的栏杆是永恒的，而河水是流逝的，但到了冬天河水结冰，人们容易产生误解，认为这些栏杆以及冰冻是真实的，到了春天后，河水又流动起来了。这就象征着 20 世纪的哲学，从关注同一转变到对异质性的关注。“上帝死了”，上帝所代表的总体性和统一性消失了，这让我们去面对异质性和流动性的问题，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在现实社会中，这个问题也突出出来，这一点劲超在文中有提到，即民族文化的多样性问题。这一点也很重要。丹尼尔在《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中提到过，在今天，庞大的、日益一体化的政治经济系统与分散的日益萎缩的个人生活的分裂。这也是我们能够感受到的一种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比如收费站和刷脸技术等。

回到文本上，我提几个问题。第一，从狄德罗的唯物主义强调生存和意志开始，经过霍尔巴赫，最后到柏格森强调绵延的异质性。对于这个过程，我的理解是，柏格森的哲学为生命哲学，它与原来的哲学有很大的不同。这种绵延强调了

一种活生生的、异质的东西，这就与尼采关于河流的比喻是一致的，也与美国詹姆斯的实用主义、意识流相关联。当时很多人关注生成性和异质性问题。你提到“相互渗透的瞬间”，对此我不是很理解。希望你能做更多的解释，包括异质的是怎样生成的。比如，拧成草绳的每一根草都是长度有限的，但却可以生成很长的绳子。只强调异质性，是否会走向另外一面？如果只有异质性，如何生成最终的同一构成的东西？中国哲学中讲的阴阳相生，我觉得比较好。这涉及到它能否处理现实中所出现的异质性的问题。

第二，巴塔耶想通过分析法西斯的心理结构来解释法西斯主义是如何整合社会底层的反抗、如何将社会的异质性因素整合到其同质中去的，对此希望你有更详细的解释。因为法西斯的确提供了一种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

第三，克里斯蒂娃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诉诸于异质的元素，一种肉体的、生理的冲动，这种冲动不像社会结构那样不能把握。如果克里斯蒂娃是这样认为的，那么她同时也认为人的肉体冲动也受社会的控制和支配，二者之间是不是存在矛盾？另外，生理结构受社会影响，这会产生出生理结构之外的、另类的事物，对这一点是否能做更多的解释？

最后，你在结语中提到，法国哲学充分关注了异质性哲学，但并没有实际地解决现实的问题，这些问题还有待于更加系统的规范的异质性哲学分析与反思。你前面提到，法国哲学中也有提到，异质性是无历史的，不可通约的，不管是伦理学，还是语言学。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怎么能够通过建立系统而规范的理论来反思这样的现实？

郑劲超：关于柏格森相互渗透的生成，我的理解是，这种绵延是跟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记忆联系在一起的。举一个攀岩人的例子，对于攀岩人来说，他的每一刻的判断和行动都跟他的生命线相联系，在这个过程中，每一个瞬间都是构成性的，在总体上形成一种绵延。第二个问题，巴塔耶是如何整合相关内容的，相关的是在社会底层很多人会被用来进行管理。巴塔耶认为，在社会结构中存在着自我整合的功能，很多时候这种功能是通过社会心理的调整实现的。第三个问题，关于克里斯蒂娃的生理冲动，生理冲动受控制总会形成一些另类的事物，但无意识是一个出发的基础，其并不是说通过生理冲动就可以对我们的社会进行一些反抗，而是要形成文学或作品的展现，也就是这种生理冲动必须通过社会的媒介才

能真正与社会发生关联。最后一个问题，异质性哲学在法国哲学中也是一个一个点，但他们之间是有共同点的，不同哲学家之间的关系又不是一种静止的塑造，他们并没有形成系统和规范的东西，而是要对特殊的要素提出特殊的解决办法，这是他们的解决路径。

逸仙实践哲学研习会第 53 期综述

逸仙实践哲学研习会第 53 期于 2019 年 5 月 9 日下午在中山大学锡昌堂 420 室举行，本次研习会由覃万历博士作报告《“到工厂去”：论〈资本论〉的启蒙修辞》，徐长福教授主持，马天俊教授评论。

报告指出，《资本论》的修辞学研究，首先意味的是《资本论》理论结构上的哲学反思，旨在增进我们对《资本论》理论建构的修辞原理的理解，以及马克思与西方思想传统之间关系的理解。报告以马克思与启蒙主义的关系为切入点，认为启蒙主义是马克思的一种文化教养，这种教养源于他自小接受的教育和环境的熏陶，发展于自主的学习和思考，以致或隐或显地见诸于后来的许多作品中，成了他的事例典故、理论术语、思想资源，尤其是未有自觉地结构化于他的文本叙事当中。《资本论》正是如此。马克思通过表层的市场舞台与工厂洞穴隐喻，以及深层的表象与本质隐喻，把启蒙主义转化成可操作性的修辞策略，结构

化于《资本论》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当中，指明资本主义市场表象背后的剥削本质，使政治经济学的话题空间顺理成章地扩展至社会现实的哲学反思。这可称为“启蒙修辞”。这意味着，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并非超越了启蒙，而是以启蒙反思启蒙。他把资本主义社会分为带有启蒙底色的表象与本质两部分，具体针对资本主义启蒙的主体身份及其主体性，但他提供的仍然是启蒙的主体身份及其主体性，亦即要把启蒙主体的个体性转换成工人阶级（人类）的整体性，把自由、平等、人权等主体性的私人性转换成自由、平等、人权等主体性的社会性，以实现启蒙运动未竟之理想，达成全人类的进步与解放。

总之，这种启蒙修辞并非《资本论》的夸饰性技巧，它作为《资本论》的理论前提，建构起《资本论》的基本结构和基本理解。

精彩互动

徐长福：马克思要否定资本主义，而资本主义自己的意识形态是自我肯定的，马克思就通过市场和工厂的反差，来表明资本主义市场中所肯定的内容都是假象，

而其实质，它的财富的生产环节，是另一番景象。所以市场上的表象就成了一个舞台上的表演，而工厂里面的是实实在在的，就像一个洞穴一样。通过这样隐喻形成反差，来突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否定。联系我们的生活实际，也可以有所感受。就这方面，我觉得万历对理论及其逻辑的理解和把握是到位的，而关于修辞，称其为包装也好、内核也好，总之有这样一个成分，蕴含其中，包含了一个表象和本质的二元区分在里面，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通过修辞的方式体现出来，作为马克思的一个文本事实也是可以接受的。最后关于启蒙的观点是我比较欣赏的，马克思作为反启蒙，但实质上他同样是在启蒙。这一点也要区分，马克思不认同市场的启蒙，而是要工厂里的解放，如果认为这同样是在启蒙，则需要讨论解放与启蒙是什么关系。最后有一个问题，你认为隐喻的修辞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有结构性作用，认为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隐喻才使得马克思有了后面的相关理论。是否有这样强的因果关系，或者是否有其他原因导致了马克思后面的思想，比如马克思一开始就有了否定资本主义的态度，这样，隐喻就只是一种表达的选择，为他的情感偏向，价值态度服务。这一点在现实中特别是在政治话语中也是这样。所以，究竟修辞在这个过程中是作为原因还是作为结果，到底修辞的建构作用是一种框架，材料的作用，还是基点，基础的作用。所以怎样确切地估计修辞所起的作用，而不是因为要研究修辞就将修辞作为最重要的。研究的功夫不是在于将自己所研究的东西放在最高位置，而是给它最恰当的估价，即使只有 1% 的作用。

马天俊：你在报告前对修辞有一个说明，将修辞区分为三种，一种为修饰性的，第二种为行事性的，比如表态、承诺、宣誓等，这也是一种公共演说和话语行为，最后你把涉及到理论的、真理的，称为建构性的修辞，这样的分法是否完备虽有待考量，但这一铺垫对你文章的呈现是有意义的，很有启发。第二方面关于《资本论》，这一方面的研究很多，但大多都有经学的色彩，通过特定的角度加以发挥，来突出《资本论》的重要性。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对马克思《资本论》的理论也需要有一些批评的因素，即站在当代人的角度去看它的不足。很多时候我们都避讳去谈论其不足之处，并默认为大家都心知肚明，但这些需要在实践中加以澄清。关于文本，发现马克思在对市场进行描述的内容中还有其作为舞台背后的像洞穴一样阴暗潮湿的一面，这也是《资本论》所呈现出来的景观，我想这一点也很有启发。最后关于启蒙这一点，总体上来说，“启蒙”这个词已经被用

坏了，成为一个太泛的概念，以至于不清楚在怎样的意义上去说它比较合适，万历在文中把马克思也归在启蒙中，把启蒙不是作为一个历史事件，而是作为文明生活一个至始至终都要有的任务，可能在十八世纪这一点比较明显，具有历史代表性，但任务并没有就此完成，还需要不断进行。十八世纪之后关于启蒙，我们都会认为其完成了一个理性的任务，但这件事并没画上句号，在这前后，抗议者是存在的，比较早的如维科，与马克思差不多同时代的克尔凯郭尔、稍早的叔本华，以及康德同时期的哈曼，包括赫尔德，他们对启蒙是不放心的。进入到理性化的时代，平等、自由、人权等这些启蒙精神，其历史效应很快就会彰显出来。而马克思所讨论的问题也在这一语境之中。循着启蒙反思的这样的思路，《资本论》就照亮了市场舞台背后的洞穴，只有洞穴被照亮后，整个资本主义的景观才最终呈现出来。可以认为，《资本论》是在之前启蒙基础上的进一步启蒙。马克思这里并不存在明显的反启蒙或遮蔽启蒙的态度，他只是拿成问题的启蒙历史来做讽刺。至于说马克思在这一点上也是启蒙的，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如果现实的社会还需要不断澄清，而作为启蒙的任务，马克思的确是给出了自己的一套说法。这套说法不仅震撼了欧洲世界，而且还震撼了全世界。关于文本的问题，第一，你说修辞、隐喻是容易理解的，但你说这种修辞结构化在资本主义的某中内涵之中，其中“结构化”是什么意思？第二，你引用沃尔夫等对《资本论》的评价，举个例子，“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个隐喻，一个异化的过程它将生命从主体替换为客体，从使用价值替换为交换价值，将人变为机器”。其中，“资本主义本身就是一个隐喻”这一种理解本身存在着困难。资本主义是一种生活方式，如果它是一套隐喻的话，尼采有一种激进的说法，不是某一种语言是隐喻，而是语言本身就是隐喻，但这种说法比尼采的更为激进，尼采无非是说语言是一种隐喻。我想当你的研究把隐喻推得如此远的时候，对理解会造成困难，我们生活中的确有各种变幻，但不是所有的变幻都是隐喻，隐喻也是一种变幻。

覃万历：关于徐老师的问题，是修辞在先还是先入之见在先，我同意徐老师对马克思的理论所作出的判断，我在文章开头也作了说明，但这种先入之见是文本之外的，关涉真假判断的问题，或许有，但本文旨在呈现文本本身的一种结构。马老师的问题，第一个是关于结构化，这是宽泛意义上的对“建构”的一种理解，没有具体意义上的限定。第二个，关于沃尔夫等人指出的资本主义作为隐喻，我

的理解是，他们是将资本主义社会作为一个抽象的对象，而没有涉及具体的资本主义生活。

邓伟生：我有三个问题，第一个是关于修辞学的，你最终将修辞定义在一个很宽泛的意义上，你将其等同于一个话语实践，特别是当你说话语实践也包括身体语言时，我觉得这样太宽泛了。这就等同于说一个两三岁的小孩子也很善于修辞，因为他通过身体语言来操控其父母的行为。这样会导致修辞的分析方式不能很好地同其他的分析方式区分开来。第二，关于《资本论》你提出有文学解读和修辞学解读，我想知道这两种解读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最后，你提到“主体性”问题，主体性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有人认为现代性的问题就是一个主体性问题。而这种主体性问题的哲学理论是从笛卡尔开始的，到康德，最后经过黑格尔，之后才有了对主体性的反思。如果从马克思来说，如何理解他与之前哲学家之间的继承关系？需要弄清主体问题和主体性问题。

覃万历：我的理解主要是寄生性的，是基于马克思《资本论》的文本分析，所以并没有将启蒙和主体性作为主题研究。关于修辞，这是一个宽泛意义上的粗糙的定位，在这里是为了方便文章的理解，没有做出具体的限定。最后，《资本论》的文学解读，更多地是关注其文学形式上的特色，而修辞学解读更多地是在理论建构上做出理解。

实践哲学读书会第 18 期综述

实践哲学读书会第 18 期于 2019 年 4 月 2 日晚在锡昌堂 420 室举行，本次由 2018 级硕士生王娇同学领读，阅读文本为金里卡（Will Kymlicka）的《当代政治哲学》第六章《社群主义》（Communitarianism）。

首先，邓伟生老师对“社群主义”这一章节做了大致的介绍，并指出了在中译文本中值得注意的名词和概念。

领读人王娇接着带领大家阅读这一文本，通过对这一章十一节内容进行梳理，详细地展示了文中的论证过程——社群主义如何针对自我和自由的社会条件对自由主义展开批驳，在批驳中又如何确立自己的观点，在此过程中自由主义又是如何辩护的。

在进入交流讨论环节之前，邓伟生老师就文中的相关重要问题予以说明，并提出一些思考，即我们应如何看待社群主义的论证，是否应囿于作者对社群主义的立场。邓伟生老师认为，在阅读此类论战性文本时，我们应该对照其论战对象即社群主义者的文本，才能更好地理解这一论辩。

最后，参与此次读书会的学生们提出了自身关切的问题，并围绕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自我观、国家观展开了讨论。

实践哲学读书会第 19 期综述

实践哲学读书会第 19 期于 2019 年 5 月 7 日在中山大学哲学系锡昌堂 420 室举行，此次读书会的阅读文本是金里卡（Will Kymlicka）的《当代政治哲学》中的《女权主义》（Feminism）章，由罗丽芳同学领读。

金里卡认为，需要一本单独的著作去讨论女权主义理论的各个分支。作者集中探讨女权主义对主流政治理论的三种批判。因为这些理论要么没能关照、要么是在不恰当地关照妇女的利益和妇女所关心的事情。

金里卡探讨了两个论点：第一，针对依据“性别中立”来解释性别歧视；第二，针对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区分。这两个论点都声称，自由主义民主正义观的重要内容带有男性偏见，而任何要想照应妇女的利益和体验的理论，都要用对关怀的强调去代替对正义的强调。金里卡认为，这两点只是在有限的范围内涉及了女权主义理论，但它们引出的重要问题却是对性别平等的任何解释都必须予以面对的。而且，它们还代表了女权主义与主流政治哲学相接触所产生的最有力的两个论点。这给当代女权主义者很多重要的启示。

实践哲学读书会第 20 期综述

2019 年 5 月 31 日晚，实践哲学读书会第 20 期于锡昌堂 420 室举行。本次读书会领读人为李婷婷同学，阅读文本为伯林的《自由论》第二章《两种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

李婷婷首先简要介绍了伯林所经历的政治、社会事件以及学术生涯。邓伟生老师补充了伯林思想的超时代性和超地域性。

所阅读的文章主要有八个小节，可分为消极自由、积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的滥用三个部分。消极自由是指存在一个最小的领域，这个领域是别人都不能阻碍我去行动的。密尔是主要的代表人物，他强调和捍卫人的最低限度的个人权利，这是第一部分的内容。

第二部分讨论积极自由，作为个体，自我是自己的主人，可以支配、决定、主导有关于自己的一切事务。积极自由的背后，自我一分为二为理性自我和欲望自我。这为自由的滥用埋下伏笔。

第三部分强调，通过改变自己的认知、禁锢自己的欲望以及逃离外在的世界回到内心自我中，这也是积极自由的一种。同时，自律就是自由，我服从自己给自己制定的法律就是自由。另一方面，当理性的自我要求自我实现、自我控制时，很容易发生对自由的滥用，即从个体的自我转向集体自我，从而打开专制主义、集体主义的大门。除此之外，对地位和承认的需求、对主权的争取很容易被认为是争取自由，但实际上这是对自由的混淆。积极自由所蕴含的自我实现，背后是“所有矛盾在未来、在理性的努力下都可以解决”的一元论观点。

在提问环节，叶甲斌提出，如何看待伯林一方面主张多元论，另一方面又十分强调消极自由（进行价值排序）这一矛盾。邓老师回应道，伯林承认各种价值之间是冲突的，但他没有排序，消极自由只是其他价值得以实现的条件。也就是说，其他的价值之所以能够实现，需要假定那个人是自愿的、没有受限制的。另一方面，邓老师不同意多元主义不能排序这一问题，他举例说政府不能为一个人的价值观排序，但可以对个人的权利进行排序。

异质性哲学讨论班第 4 期综述

2019 年 3 月 15 日下午，异质性哲学讨论班第 4 期在中山大学锡昌堂 420 室举行。本期由叶甲斌领读《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两种思维方式的僭越与划界》（修订本）（下文简称为《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第三章《理论思维和工程思维概述》，覃万历博士主持，周宏胤评论。

第三章是该书承上启下的一章。第二章揭示了从工程论视角得到的虚体和实体二者相生的本体论图景，在此基础上第三章阐述对应的认识论图景：从对象世界存在虚体和实体推论出思维世界有虚体思维和实体思维这两种可能的思维方式。虚体思维是将属性联结成道理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讲理的思维方式，其特征是力求逻辑自洽、规避自相矛盾。实体思维是实体的存在状态所必然要求的一类思维方式，其根本特征是对各种逻辑推知的属性进行非推导的复合。简言之，从思维方式出发到规定出理论思维和工程思维需要三步。首先，以对象世界的结构（虚体-实体），即客体规定性为标准，将思维方式区分为虚体思维和实体思维。然后以人的实际需要（认知-筹划），即主体规定性为标准，进一步区分可得到认知型虚体思维、认知型实体思维和筹划型实体思维。依据现实性程度的不同，上述思维方式还可以区分出日常和专业两个层次。最终，专业层次的认知型虚体思维即为理论思维，专业层次的筹划型实体思维即为工程思维。由此，这两个关键概念在本书中首次得到指认和界定。本章余下部分接续论述了理论思维和工程思维的一般规定和相互关系。

在叶甲斌的领读过程中，大家就本章内容的重点和难点展开了讨论。讨论主要围绕着两个主题展开。第一个主题是实体思维中统观的含义。胡志刚副教授探讨了统观与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提出的统觉概念的可能联系。徐长福教授指出，统观概念旨在说明实体思维的道理，它与康德哲学中统觉概念的含义基本一致。在异质性哲学的指谓分析法中，统观的机能是使用主词的能力，与《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对统观的界定有所不同。第二，是否存在筹划型虚体思维的问题。从思维方式规定出理论思维和工程思维的推论中加入主体规定性（认知-筹划），加上实体-虚体的区分，逻辑上可得出认知型虚体思维、筹划型虚体思维、认知型实体思维和筹划型实体思维这四种思维方式。然而，根据书中的论述，虚

体（道理、规律）只可以认识，不可以改造，因此，筹划型虚体思维是不存在的。很多同学对此感到困惑。在他们看来，提出一套学说、论证一些理论等提法似乎暗示了存在着某种筹划型虚体思维。在叶甲斌看来，问题的归结在于怎么理解“存在着某种筹划型虚体思维”中的“筹划”、“虚体”和“存在”。“筹划”是只限于揭示道理，还是为了其他目的有意编造？“虚体”是事物的属性之间必然联系而构成的理，还是更低层次上包含修辞成分的论？“存在”是指事实上存在，还是逻辑上存在，抑或应该存在？按《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的界定，虚体是理，其中的必然联系只能被揭示，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退一步讲，即便揭示道理的方式无论如何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主观能动性，也可以最终追溯到主观的态度来加以辨认：到底有没有把试图揭示的道理当作客观规律。实际上，该书的第六章《工程思维的僭越》对筹划虚体思维的问题作了更详细的阐释。因此，与其说本次讨论的主要意义在于解决了一些理解上的困惑，毋宁说提供了继续思考本书的重要线索。

异质性哲学讨论班第 5 期综述

异质性哲学讨论班第 5 期于 2019 年 4 月 11 日在中山大学锡昌堂 420 举行，由中心成员胡志刚副教授（广东省委党校）领读《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两种思维方式的僭越与划界》第四章《理论思维的僭越（上）》，王兴赛主持，叶甲斌和周宏胤评论。

本章主要讨论理论思维在认识上的僭越，揭示了在认知实体过程中，理论思维所进行的参与及其造成的影响。认知实体对理论思维来说本属兼职，但久而久之却被看成了本质，这就构成了在理论思维过程中的理论态度。理论思维通过“个别—一般—个别”的方式作为对实体的认识。但是这种认知，不过是将实体还原为其某种特定的属性，也即将实体认作为虚体的一个实例。

在本质主义程序的参与下，这种以单一属性作为实体认知的方式获得合理性。该程序在哲学形而上学中的表现就是各种本质主义观念，这些观念也影响了形下科学对实体的理解，比如将特定学科或特定学说所观察到的实体属性看得比实体身上的其余属性更加重要。这样一来，实体身上那些非本质的属性就成为剩余属性，剩余属性是理论思维认知实体的必然产物。这种思维的认知在作用于人类对实体的工程建构时，剩余属性就会以问题属性暴露出来，成为现实的问题，从而也导致了本质主义的合理性的下降。

异质性哲学讨论班第 6 期综述

异质性哲学讨论班第 6 期于 2019 年 5 月 29 日在中山大学锡昌堂 420 举行，由杨兴升领读《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两种思维方式的僭越与划界》第五章《理论思维的僭越（下）》，周宏胤主持，叶甲斌评论。

本章的主要内容是理论思维的第二重僭越，即从认知实体到筹划实体的僭越。文章首先揭示了理论思维的传统自我意识状况，以说明理论思维与工程设计之间的矛盾，并在此基础上着重探讨理论思维在人文社会工程设计上的误用及其后果。由于理论思维在人类认识史上长期一统天下，人们对它形成了一套完整却错误的观念，即理论思维能够并且应该一以贯之地展开虚体认识、实体认识和工程筹划，从而包办人类认识世界的全部任务。但是，若从工程设计本身的特点去看待它，理论思维的问题就会更加暴露。工程设计的特点可以概括为：以价值当事人的特定需要为出发点，以本原虚体和邻近虚体为依据，以工程主体的本原需要和邻近需要的关系、各种相互客体的本原属性和邻近属性的关系、本原客体 and 邻近客体的关系，以及这些关系之间的关系等为对象，以工程实体的完形为归宿。当理论思维用于认知虚体的时候是正当的和必要的，当它僭越于实体认知和工程设计的时候则犯了本质主义的错误。用理论思维设计人文社会工程的实质就是工程价值内涵的应然化与无矛盾化。由于人文社会工程缺乏物质形态工程那样的免疫力，只有当理论思维所设计的工程彻底失败了，这种思维方式的弊端才暴露无遗。用理论思维设计人文社会工程的观念后果，就是应然化和无矛盾化、但不可实施的工程，就是乌托邦工程。人文工程之最典型者就是人格工程，社会工程之最重要者就是制度工程。用理论思维设计的人格工程为乌托邦人格，以之设计的制度工程为乌托邦制度。用理论思维设计人文社会工程的操作后果，就是将每个人变成某个特定本质的化身，就是人的完形的肢解。

异质性哲学讨论班第 7 期综述

异质性哲学讨论班第 7 期于 2019 年 6 月 13 日在锡昌堂 420 课室举行，刘畅领读，周宏胤主持，李婷婷评论。本次阅读文本为《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两种思维方式的僭越与划界》第六章《工程思维的僭越》。本次主要讨论的问题如下。

第一，“价值性事实”是否存在？价值性事实似乎不如非价值性事实那般存在于世界之中，它更像是一种在特殊环境之下人们的普遍共识，也即价值的客观性实为无数的主观性汇聚而成的。

第二，“虚体的客观必然性”是否真实存在？马哲专业的同学对于客观必然性必定是敏感的，因为马克思有明确否认过那种“万能药方”式的历史哲学。阅读材料中所提及的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属性间的必然联系”的真实性存在与否，便成了在场同学们普遍的一个疑问。

此外，同学们关注的问题还有，“工程思维的僭越”是否应当被批判？在真实的学术实践中，我们是否能够清晰地在“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之间划界？在人文社科领域如何划分理学和工学？

◆学术成果◆

徐长福：《直观认识与符号认识——异质性哲学引论》

中心主任徐长福教授在《江海学刊》2019年第2期发表论文《直观认识与符号认识——异质性哲学引论》。论文指出，异质性哲学的主旨在于从学理上解释认识与实践的反差，尤其是理论性认识与实践的反差。该反差是指，一些对实践的预先认识，尤其是理论性认识，跟实践的实际后果明显不一致。要解释这种反差，必须考察认识的机制，看看何种认识或认识在何种情况下比较可靠，何种认识或认识在何种情况下比较成问题，以及实践跟认识相比有哪些特点，认识在实践中如期实现的自身条件有哪些，缺失这些条件可能导致哪些后果。认识的机制很复杂，需要先考察认识的基本结构，把直观认识与符号认识作为该结构的两个层面，把直观认识作为比较可靠的区域，把符号认识作为比较成问题的区域，把他们之间的异质性确定为基础异质性，为异质性哲学进一步分析符号认识的机制和问题铺设一段小路。

江璐：《道德行为归责的可能性》

该文审视了聂敏里《意志的缺席——对古典希腊道德心理学的批评》一文中提出的几个基本观点，即古希腊意志概念的缺席、康德意志概念的优越性、行为之道德属性应归责于意志以及赖尔对意志概念的消解之无效性，并对其各自做了回应。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和考量，该文提出如下观点：（一）与狄勒“古希腊无意志”一说中所发现的、在古希腊哲学中缺席的意志概念，对应的是康德的自由抉择（Willkür）概念，而非其意志（Wille）概念——康德将道德的善恶归责于自由抉择，而非作为实践理性的意志；（二）康德也认识到了赖尔所批评的身心间因果作用的问题，而重视赖尔所提出的问题，有助于进一步理解康德将意志限制到道德领域的做法。

江璐：《〈名理探〉中对逻辑作为一门科学的讨论》

中心成员江璐副教授在《逻辑学研究》2019 年第 1 期发表论文《〈名理探〉中对逻辑作为一门科学的讨论》。该文以《名理探》之《五公卷之一》中对逻辑之名称、内容、地位、内部划分等的讨论为对象，对照了其蓝本科因布拉亚里士多德逻辑注疏，结合当时文艺复兴的知识教育背景，分析了《名理探》中关于逻辑作为一门科学的论述，由此而发也指出关于逻辑之界定的思索也是一个省思中国古代逻辑是否能与西方逻辑汇通的这个基础问题的出发点。

江璐：《康德之人格性概念的形而上维度》

江璐副教授在《哲学分析》2019 年第 1 期发表论文《康德之人格性概念的形而上维度》。该文认为，对康德哲学中“Person”和“Persönlichkeit”概念加以清晰区分是必要的。以康德文本为基础对这两个概念加以界定和阐述，目的是从关于人格性之实在问题的探讨出发来展现它是如何为伦理学中的“义务”、“道德”和“归责”这些核心概念提供一种形而上的奠基的。

郝亿春：《价值与“心”》

该文指出，价值哲学是对时代价值问题的回应。布伦塔诺以“内在价值”的三重规定对价值哲学进行“内转”并回应了时代的价值问题：作为“明见价值”的个体“小太阳”核准为“盲目价值”的“大太阳”；作为第一人称经验的“质料价值”取代普遍而空洞的“形式价值”；以促进“心现象”完善的“目的价值”规导作为“物现象”的“手段价值”。其中，“内在价值”在推进启蒙运动所确立的个体成为“真实”而“有心”的存在者的同时，也面临其为“唯我论”与“相对主义”的误解与指控。鉴于此，该文认为当代哲学对“心”与“内在价值”的刻意否弃恰恰表明其不可消解性，即便当今盛行的政治哲学也需补充“内在价值”的维度。

邓伟生：《人生计划、运气与美好人生》

中心成员邓伟生副研究员在《现代哲学》2019 年第 1 期发表论文《人生计划、运气与美好人生》。该文指出，根据罗尔斯《正义论》的价值理论，一个东

西是好的或有价值的，当且仅当一个有理性的人在有充分信息和具有慎思理性的情况下会选择它。因此，一个美好的人生，就是一个有理性的人在有充分信息和具有慎思理性的情况下会选择过的人生计划。这样的生活不一定成功，但可以保证当不成功时当事人没有理由后悔，也没有理由责备自己。罗尔斯的这一理论，受到不少批评。该文主要讨论来自拉莫尔和威廉斯的批评。这些批评可分为强和弱两种：一、人生计划这观念本身就是错误的；二、人生计划观念本身没有问题，但罗尔斯的理论是错的。该文尝试论证，强批评很难成立，而弱批评有些能被罗尔斯理论恰当回应，有些则不能——特别是威廉斯基于运气的批评——这使得我们有理由放弃罗尔斯的上述理论。也就是说，罗尔斯的理性的人生计划理论是不成立的，但这并不表示人生计划本身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张守奎：《〈共产党宣言〉在台湾地区的传播和研究》

中心成员张守奎副教授（深圳大学）在《现代哲学》2019年第2期发表论文《〈共产党宣言〉在台湾地区的传播和研究》。该文认为，《共产党宣言》在台湾地区的传播和研究，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完整图景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引起学界的重视。从传播和研究进程来看，《共产党宣言》在台湾地区经历了日据时期的“解放学说”、戒严时期的“妖魔理论”和解严之后的“一种理论学说”形象的改变。思想是时代的精神镜像，台湾地区对《共产党宣言》认知形象的改变背后实际上折射的是时代变迁。对《共产党宣言》在台湾地区的传播和研究史进行系统化地梳理，既有助于丰富我们对《共产党宣言》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史的认识，也有助于拓展和深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内涵的理解，还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

张守奎：《马克思财产权批判理论的生成逻辑及当代意义》

张守奎副教授在《长白学刊》2019年第1期发表论文《马克思财产权批判理论的生成逻辑及当代意义》。该文指出，马克思的财产权批判理论既内生于近代西方思想史传统，又不同于主流财产权理论。与主流财产权理论不同，马克思

不是“证成”而是“证否”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关系。在区分“作为劳动的私有财产关系”和“作为资本的私有财产关系”的基础上，他不是要证成私有财产与人格的内在“同一”，而是要相互“分离”。他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财产权本身就是反人格的”，资本家对私有财产的掌握和垄断对无产阶级而言“是摧毁而不是培育了人格”。对私有财产的认知和批判，马克思总体上经历了青年时期的思辨哲学或形而上学视角，到过渡时期的社会哲学视角，再到成熟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角不断深入的进程。马克思财产权批判理论的思想特质，在当今资本全球化时代依然具有时效性。

谢翱：《费尔巴哈感性哲学的再思考》

中心成员谢翱博士在《现代哲学》2019年第2期发表论文《费尔巴哈感性哲学的再思考——兼论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关系》。该文指出，费尔巴哈感性哲学革命从对理性主义传统的改革与颠覆开始，坚持“感性第一性”原则，希望通过“感性”与“感性直观”回归感性的生活世界。但这一革命很少受到学界严肃而认真的对待，“感性第一性”原则及“感性直观”的积极意义为“感性活动”所遮蔽。实际上，马克思的感性革命就是将他的“感性第一性”原则扩充、发展为“感性活动”即实践原则。此外，作为感性哲学出发点的“人”也不是抽象的“一般人”，而是感性个体，不过费尔巴哈对其历史内容没有进行具体阐释，马克思则在感性与历史统一的基础上提出了“现实的人”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出发点。

王千陌：《自由主义自我观念的价值虚无主义悖论》

中心成员王千陌博士在《海南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发表论文《自由主义自我观念的价值虚无主义悖论——以桑德尔对罗尔斯的批评为例》。该文指出，自我优先性及其所引发的价值虚无主义问题，一直是社群主义的自由主义批判的重点。针对这样一种批评，罗尔斯发展了另一种较为温和版本的政治自由主义。但是，无论是罗尔斯的原初版本还是金里卡等人对此问题的扩展性解释，均未能避免政治自由主义持有自我优先于目的这一本体论预设。甚至可以说，自我优先于目的是任何一种形式的自由主义所退无可退的底线。而桑德尔对自由主义自我

观念的批判，绝不只是一个“语义学”问题，其关涉到主体对于“追寻美德”是否具有某种先天的义务。然而，自由主义用以对抗价值虚无主义的种种论证，要么是导向了更深的价值虚无主义，要么是其自我先于目的的本体论结构所不能容纳的。因此，自由主义在对抗价值虚无主义的问题上，陷入了一种本体论层面的悖论。

王千陌：《黑格尔国家观念的二重性》

王千陌博士在《湖北社会科学》2019年第5期发表论文《黑格尔国家观念的二重性——论法哲学中国家观念的经验性与概念性》。该文指出，学界对黑格尔法哲学研究，长期存在一种趋同化倾向。该文则试图从历史、法哲学、逻辑学三个方面的平衡入手，对黑格尔的国家观念进行一种全新的解读。该文认为，黑格尔在其《法哲学原理》表述了一个二重化的国家观念，一方面是经验中的国家，另一方面是概念中的国家，而“巧合”的是，国家观念中的经验成分竟然与黑格尔时期的普鲁士国家的实际建构出奇的一致，同时两个方面的国家又以理性的名义完成了同一。该文将一方面以实证的态度还原法哲学中国家观念的经验成分的实际历史承担者，另一方面以逻辑的方式还原国家观念的内在推理，最终，越过二者的断裂，考察黑格尔法哲学背后所隐藏的现实合理化的致思理路。